

俄羅斯《黑皮叢書》簡介

高田時雄

衆所周知，俄國的東方學有很長的歷史，迄今為止留下了許多出色的成果。可以說，特別是俄國國內所藏的貴重寫本或刊本的整理、研究與出版，對世界學術界而言是無法取代的貢獻。它們因時代不同而以各種形態公開發行，自20世紀中葉以至現代相繼出版的學術叢書《黑皮叢書》(Черная Серия)無疑是其中的代表作。筆者想在此對《黑皮叢書》進行簡單的介紹。

《黑皮叢書》由於一直使用黑色封面而有這種俗稱，創刊於1959年，出版時最初被稱為《東方各民族的文學遺產》(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在該叢書名下，自1959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0種60冊。最初包括了大型叢書(17種32冊)、小型叢書(16種17冊)與翻譯叢書(7種11冊)等三種下位叢書。計劃時尚有“創作文學遺產”、“民俗遺產”等叢書作為出版對象，不過最終沒有實現^①。《東方各民族的文學遺產》大小兩種叢書，不同之處僅在於原寫本的大小，都以公開發行珍貴的文本為主要目的。從出版形式來看，既有保留了貴重文獻原有形態的影印本，也有經過嚴密校勘的校訂本。影印本幾乎都是俄國國內、而且是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所藏的文本，這是該叢書最大的學術意義所在。而且翻譯叢書意在為學術界提供正確的俄語譯本，其作用有些不同，但將專家以外的人難以理解的文獻內容準確地提供給

作者單位：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① Кононов А.Н., Дрейер О.К., Темкин Э.Н., Цельникер С.С.,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серийных публикаций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остока,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85 № 2, p.158.

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其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儘管如此，將叢書一分為三的做法，無論在出版的實際方面，還是在學術慣例上都很不妥當。因此到了1965年，三種叢書被合併為《東方文獻遺產》(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стока)。其後經過半個世紀，至今仍繼續使用此名稱^①。自1959年以來，截至2011年出版的文獻總數達138種，在地理上從西亞到印度，從中亞到東亞，再到東南亞，包括了所有地區；在時代上從上古到近古，取材範圍涉及歷史、宗教、思想、文學、法制等人類文化的各個方面，說它是以網羅東方世界文獻遺產為目的的集成也不為過。

沒有了表面上的下位區別，雖然根據書籍的內容既有原本的影印或校訂本，也有譯本，多種多樣，但一直堅持了出版可靠的文本這個最初的方針。此外，遺憾的是過去的影印本在清晰度上未必令人滿意，而最近出版的幾種書附有收錄了精緻的彩色圖版的光盤，可以充分滿足學者的需求。

關於該叢書付諸刊行的經過，與俄國東方學的歷史有關，需要作一些說明^②。在帝俄時期的1897年，由於奧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的提議，國際性叢書 *Bibliotheca Buddhica* 創刊，印度學、佛學的重要文本以叢書形式開始刊行，不久該叢書就具有很高的權威，作為首創於俄國的學術叢書是最成功的。其後，根據巴托爾德(В.В.Бартольд)的提案，俄國科學院開始刊行《中亞史文獻》叢書，僅於1915年出版了波斯文寫本《帖木爾遠征印度記》第一冊，就因為革命的混亂而無法繼續下去。雖說是受了時代背景之害，但或許可以看作一個失敗的事例。在革命告一段落、社會狀況稍微恢復安定的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學術界再度進行文本的公開出版。其中心是以過去的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為基礎於1930年新設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然而其出版活動是單獨而零散的，並非有系統的叢書形式。蘇聯的東方學學術界，由於斯大林的肅清，學者人數減少了，其影響是難以否定的，而且1941年開始了所謂的“大衛國戰爭”(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列寧格勒圍城戰導致犧牲者進一步增加，再加上學者由於疏散而與寫本隔絕等負面因素，出版活動基本上陷入了麻痺狀態。

① 近年的出版品在扉頁上特意注明“本叢書創刊於1965年”。

② 這個部分的敘述多借助於205頁注①所舉Кононов.А.Н.等的文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過了一段時間就迎來了新的時代。50年代在東方學領域也開始了世代交替，探討學術界的改革與重組問題。學究式的東方學受到批評，1956年9月7日舉行的蘇聯科學院常務委員會決定重組東方學研究所。決議認為，東方文獻涉及廣闊的範圍，其出版是不可缺少的，為此成立了附屬於研究所的東方文學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此外，東方學研究所的五年計劃(1956—1960)中有成立以科學院院士奧爾別利(И.А.Орбели)與通訊院士別爾捷利斯(Е.Э.Бертельс)為主持者的“東方各民族的文獻資料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定位”特別研究班的計劃，其中包括了24種文獻遺產的出版計劃。參加該計劃的，不僅有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人員，還有列寧格勒、莫斯科兩個大學的學者，又有塔什干、杜尚別、巴庫、埃里溫等各共和國的科學院。1960年在列寧格勒恰好舉行第25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①，東方學研究所配合該會議，制訂了出版重要而有特色的寫本的計劃。無論如何，這在俄國是一個具有空前規模的計劃。據說其構想中的模式，就國內而言是上述的 *Bibliotheca Buddhica*，就國外而言則是《吉布紀念叢書》(*Gibb Memorial Series*)^②。

其次，我們來看該叢書迄今為止刊行了哪些文獻。首先，刊行或開始刊行於創刊初期的有如下書籍：朝鮮史書——金富軾《三國史記》(大 I, 1959—2002^③)、別爾捷利斯(Е.Э. Бертельс)等校訂的波斯最長的民族敘事詩——菲爾多西(Ferdowsi)《列王記》(亦稱《王書》)共9冊(大 II, 1960—1971)、波斯的抒情詩人薩迪(Saadi)的《薔薇園(古力斯坦)》(大 III, 1959)、以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僧侶體書寫的紙草文書《溫·阿蒙巴比倫旅行記》(大 IV, 1960)、蒙兀兒王朝的詩人阿米爾·霍斯勞(Amir Khusrow)創作的烏都文學的名作《萊拉和摩君》的校本(大 VII, 1964)、17世紀侯賽因(Hussein)所著的奧斯曼王朝的歷史《驚異的事件》(*Beda' i' ul-Veka' i'*) (大 XIV, 1961)、庫爾德歷史的重要文獻

① 實際上其後改在莫斯科舉行。

② 為紀念早逝的東方學學者 Elias John Wilkinson Gibb (1857—1901)，其母親吉布夫人 (Mrs. Jane Gibb) 捐贈了一筆基金。1905年利用此基金開始出版該叢書，主要出版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的文本。

③ 以下在括號內標上本叢書的號碼與刊行年份。1965年以前的書籍，在號碼前冠以“大”、“小”、“譯”字以區分下位系列；1965年以後的新叢書僅標明號碼。

Sharaf-name (XXI, 1967—1976) 等。此外, 引人注目的出土文獻有以于闐塞語書寫的韻文的佛教教理書《巴德拉的故事》(I, 1965)。過去被稱爲“《E》寫本”, 現在多稱之爲《贊巴斯特之書》^①。書中夾雜了佛教的許多故事, 不僅是于闐佛教的重要資料, 更被視爲于闐塞語文學的明珠。此書由沃羅比耶夫—傑夏托夫斯基 (В.С.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 與沃羅比耶娃—傑夏托夫斯卡婭 (М.И.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夫婦整理後出版。在已知的寫本上加上新發現的 10 頁和 9 個殘片後影印出版, 並附有俄語譯文與見於該書的于闐塞語的詞語, 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

至於小型叢書, 有以塔吉克語寫成的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的歷史》文獻 (小 I, 1959)、莪默·伽亞謨 (Omar Khayyam)《魯拜集》(小 II, 1959)、莪默·伽亞謨的《代數論》(小 III, 1961), 霍列茲米 *Mukhabbat-name* (小 IV, 1961) 是 14 世紀寫於欽察汗國的突厥語的詩集。此外, 10 世紀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杜拉甫 (Abu Dulaf) 的《第二書》(小 V, 1960) 是關於高加索、伊朗地區歷史地理的最重要的文獻。在遠東方面, 有朝鮮的漢文詩歌集《百聯抄解》(小 VI, 1961)。這是罕見的刊本, 影印俄國所藏文本並附上譯文出版。有名的薩滿文獻《尼山薩滿傳》(小 VII, 1961), 在列寧格勒 (當時) 的東方學研究所所藏的滿文寫本的影本之外, 還附有音譯文本及譯文。

而翻譯叢書中有穆罕默德·卡齊姆 (Muhammad Kazim) 的歷史書的部分譯本《納迪爾沙的印度遠征》(譯 I, 1961)、《摩奴法論》(譯 II, 1960), 埃及的歷史家阿勒·雅巴爾提 (Al-Jabarti) 記敘拿破侖入侵埃及的編年史 *Aja'ib* 已刊的 3 冊 (譯 IV, 1962—78)、《布瑞哈德·阿冉亞卡奧義書》(譯 V, 1964), 17 世紀土耳其的埃雷米亞·切列比 (Evliya Çelebi) 的《旅行記》3 冊 (VI, 1961—83)。

至於有關中國的文獻, 在早期刊行的書籍中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祕史》第 1 冊 (大 VIII, 1962) 的影印本的公開出版。這是俄國漢學家帕拉季 (Палладий 即 П.И.Кафаров) 在 1872 年得自北京、現藏於聖彼得堡大學的寫本, 該寫本不同於通常分爲 12 卷的《元朝祕史》, 是唯一的 15 卷本。遺憾的是預定出版 4

^① 此書名是因爲寫本的跋中有“官員贊巴斯特命人書寫”, 出於英國學者貝利 (H.W.Bailey) 的提議。參照 R.E.Emmerick, *The Book of Zambasta: 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 1968, London, preface.

冊，實際上只出版1冊就中斷了。

蘇聯的東方學研究對象相對而言偏重於西亞、中亞、印度等地，或許是無可奈何的。然而在阿拉伯、波斯、希伯來、科普特等地以外，還包括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前蘇聯聯邦的各個共和國或俄國少數民族的文獻，在某種意義上雖可說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仍然可用壯觀一詞來形容。近年進一步擴大了收錄範圍，15世紀末孟加拉的具有宗教、神話內容的敘事詩《蓮華的傳說》(C, 1992)、早在前二千年的寫在楔形文字泥板上的古代文獻《烏加里特傳說》(CV, 1993, 1999)、馬來語的《大君馬拉卡爾馬物語》(CXXIX, 2008)等也在該叢書中刊行。

關於上述《黑皮叢書》的全貌，1959年至1985年出版的全部書目已經附上簡明的解題公開發行^①，截至2011年的部分也準備了作為內部資料的解題目錄^②。估計後者會在適當時候合併在新出的增補版的解題目錄中，請有興趣的讀者參考上述各書。下文想對有關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文獻作重點介紹。

維亞特金(Р.В.Вяткин, 1910—1995)所譯的司馬遷《史記》(XXXII)的俄語譯本(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於1972年開始刊行。譯者去世後，其子(А. Р.Вяткин)等人繼續努力，收入列傳部份最後20卷的第9冊於2010年刊行，全書終於告成。關於《史記》的譯本，此前已有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法語譯本^③、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與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的英語譯本^④，但都沒有譯完全書130卷。維亞特金的俄語譯本享有最早將《史記》全卷翻譯成歐洲語言的榮譽。

孟列夫(Л.Н. Меньшиков)的敦煌寫本研究成果主要是在該叢書中刊行的，這一點廣為人知。《影印敦煌讚文附宣講》(大XV, 1963)刊行了俄藏敦煌寫本中的金剛經讚、十空讚、太子讚、五臺山讚文、淨土法身讚、往生極樂讚、寶鳥讚、蘭若空讚、兒出家讚、金剛五禮、涅槃讚、南宗讚、入山讚文等佛教的

①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Каталог серийных изданий 1959—1985. Москва, 1986. 收入1976年為止的該叢書出版品的解題書目於1977年出版，這是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增補的。

② Список книг серии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стока» (1986—2011) с аннотациями.

③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Paris, 1895—1905.

④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1961 (改訂版, 1993); Nienhauser,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Bloomington, 1994—2008.

讚，並加上宣講文本的影印，附有詳細的導論。同氏的《維摩詰經變文附十吉·變文》(小VIII, 1963)在Ф-101、Ф-252、Ф-223的影印本之外附有研究與譯文。此外，《雙恩記》(XXXIV, 1972)中刊行了Ф-96寫本，《妙法蓮華經講經文》(LXIV, 1984)刊行了Ф-365R寫本，兩書同樣附有譯文與研究。《雙恩記》第二冊有佐格拉夫(И. Т. Зограф)的語法研究與詞彙，提出了新的方案。這些書籍的出版都在敦煌俗文學研究的領域裏提供了新資料，在研究史上留下重要的足跡。

談到俄藏敦煌遺書的公佈，還有丘古耶夫斯基(Л. И. Чугуевский)多年研究成果的《敦煌漢文文書》(1983)，這是不應該忘記的。本書集中介紹了俄國所藏的敦煌漢文文獻中的世俗文書的殘片，很受學術界的關注，也有漢語譯本^①。

雖非漢文文獻，但在近年出版品中作為出土文獻受到關注的有《東突厥斯坦出土摩尼教寫本》(CXIX, 2011)。本書公佈了俄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藏的以中古的波斯語及帕提亞語書寫的摩尼教文獻的所有殘片共83片，包括影本、拉丁字母轉寫、俄語譯文、注釋、詞彙，卷首有俄國所藏文獻的研究史、包括對摩尼教及摩尼教文獻的解說的詳細緒論。此外，回鶻文《大白蓮社經》(CXXVII, 2008)是題為*Abitaki*(阿彌陀經)的吐魯番出土的回鶻佛典，編者圖古舍娃(Л.Ю. Тугушева)認為這是譯自漢文原典《大白蓮社經》的。

俄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還以藏有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取自黑水城的大量的西夏語文獻著稱，克恰諾夫(Е.И. Кычанов)、克平(К.Б. Кепинг)等整理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已在該叢書中出版，有《西夏語譯中國古典(論語、孟子、孝經)》(IV, 1966)、《文海》二冊(XXV, 1969)、《新集錦合辭》(XL, 1974)、西夏文《孫子》(XLIX, 1979)、《類林》(XXXVIII, 198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LXXXI, 1987—1989)4冊、西夏文《新集慈孝傳》(LXXXVII, 1990)、《孔子和壇記》(CXVII, 2000)、《雜字》(CXXI, 2002)。

在上述書籍之外，還刊行了以下的漢文文獻：《商君書》(XX, 1968)、紀昀《閱微草堂筆記》(XLIV, 1974)、《蒙韃備錄》(XXVI, 1976)、袁枚《新齊諧》(LV,

① [俄]丘古耶夫斯基著，王克孝譯，《敦煌漢文文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977)、《契丹國史》(XXXV, 1979)、《新編五代史平話》(LXV, 1984)、《百喻經》(LXXVI, 1986)、《大唐三藏取經詞話》(LXXXII, 1987)、桓寬《鹽鐵論》2冊(CXXV, 2001)、康熙《御纂朱子全書》66卷中第44卷——朱熹《心論》(CXXII, 2002)的譯本等,可見其內容多種多樣。此外,《普明寶卷》(LVI, 1979)是對俄國所藏《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加以詳細的注釋後出版的,還聽說同類的文本也在準備刊行。《大明律集解附例》(CXIII, 1997, 2002)就是所謂的《大明律》,估計尚需一定時間纔能完成,作為對日本、朝鮮都有影響的中國古代法典的集大成者受到關注。《嶺外代答》(CXXXI, 2001)是南宋周去非的地理書,對廣西及東南亞、西亞各國的地理、風土、物產都有具體的敘述,是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資料。《周禮》早有法國比奧(Édouard Biot, 1803—1850)的法語譯本^①,最近出版了庫切拉(С. Кучера)的俄語譯本(CXXXVI, 2010)。剛出了第1冊“天官”部分,期望將來可以完成全書的翻譯。

關於中國以外的所謂漢字文化圈各國的文獻,首先,日語文獻既有《出雲風土記》(XIII, 1966)、《古風土記(常陸、播磨、豐後、肥前)》(XXVIII, 1969)、兼好法師的隨筆《徒然草》(XXIX, 1970)、平安時代的“物語”文學作品《大和物語》(LXX, 1982),也有世阿彌(1363?—1443)的能劇理論書《風姿花傳》(LXXXIX, 1989)。此外,《祝詞、宣命》(XCVII, 1991)是日本古代的重要文獻。祝詞是祭祀時神官獻給神的言語,宣命是天皇的命令,都是使用漢字寫成的日文。再者,伊勢的海上商人大黑屋光太夫(1751—1828)在1782年遇到風暴漂流到阿留申群島中的一島,被帶到彼得堡,得到葉卡捷琳娜二世許可後回國。《北槎聞略》(XLI, 1978)是在其見聞的基礎上由桂川甫周編纂的日本最早的俄國地理誌。大槻玄澤、志村弘強《環海異聞》(大 XVI, 1961)也是漂流者的見聞錄,在該叢書的早期已經刊行。作為日俄通好史的史料,這種記錄在俄國早已受到關注。

關於朝鮮的文獻,除了上述的《三國史記》、《百聯抄解》,尚有《崔忠傳》(XVIII, 1971)、《春香傳》(XIX, 1968)、《訓民正音》(LVIII, 1979),此外,漢文小說《林將軍傳》(XLVIII, 1975)也已出版。在有關越南的方面,有敘述了自上古

① *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 2 tomes. Paris, 1851.

至李朝(1009—1225)的越南編年體漢文史書《越史略》(LIX, 1980),而黎朝的史官吳士連編纂的《大越史記全書》(1479年成書),已經出版了第1冊、第2冊(CXXX, 2002, 2010)。

至於漢字文化圈以外的書籍,有蒙古的史書《黃金史》(*Altan Tobchi*)(X, 1973)、西藏的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的《情詩》(LXXI, 1983)、《額爾德尼召志》(CXVIII, 1999)。阿格旺多傑《自傳》(CXXXIII, 2003)是20世紀初以積極介入西藏政治而聞名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喇嘛的記錄,是近代史的精彩史料。同屬蒙古系統的衛拉特族的文獻《衛拉特詩語辭典》(CXX, 2010)是17世紀衛拉特傑出的宗教領袖咱雅班第達納木喀嘉木措(Zaya Pandita Namkhai-Jamtsu)編纂的詩語辭典,廣泛引用了梵語、藏語的典故。

有名的《突厥語大辭典》第1冊(CXXVIII, 2010)是11世紀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al-Kashgari)以阿拉伯語編纂的突厥語辭典,不僅收錄了各地的方言,而且大量引用了成語與諺語、民間故事、詩歌,提供了研究突厥語、突厥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這個珍貴的文獻遺產不但已被翻譯為土耳其語、烏茲別克語、維吾爾語等突厥語系的多種現代語,還有丹科夫(R. Dankoff)的英語譯本^①,也有漢語譯本^②。關於俄語譯本,已有2005年哈薩克斯坦出版的版本^③,本叢書的版本附有科爾穆申(И.В. Кормушин)、波采盧耶夫斯基(Е.А. Поцелуевский)、魯斯塔莫夫(А.Р. Рустамов)三位學者詳細的注釋,期望今後繼續出版。

以上對《黑皮叢書》作了簡單的介紹。最後想談的是,上文提到的奧登堡主編的國際性叢書 *Bibliotheca Buddhica* 將以合併於《黑皮叢書》的形式繼續出版,這是值得關注的。例如譯自巴利語的《法句經》(*Dhammapada*)(譯 III, 1960)是 *Bibliotheca Buddhica* 的第31種,《中亞出土印度語文獻》第一冊(LXXIII-1, 1985)是第33種,第二冊(LXXIII-2, 1990)是第34種,同書第三冊(LXXIII-3,

①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1985.

② 《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③ Mahmud al-Kashghari, *Diwan Lughat at-Turk*,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Z.-A. Auezova, Almaty “Daik-Press”, 2005.

2004)是第40種,世親(Vasubandhu)《阿毗達磨俱舍論》(*Abidharma-kośa*)梵語原典(LXXXVI, 1990)是第35種,譯自巴利語的《彌蘭王問經》(LXXXVIII, 1989)是第36種,蒙古的佛教故事《Chojjid dagini 的故事》(XC, 1990)是第37種,慧皎《高僧傳》第1冊^①(XCIX, 1991)是第38種,《聖彼得堡藏寫本甘珠爾目錄》(CII, 1993)是第39種,有關情況大略如此^②。

① 艾爾馬科夫氏(М.Е.Ермаков)譯注的《高僧傳》第2冊,已於2005年作為創刊於1993年的新叢書《東方文化遺產》(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туры Востока)的XVIII出版。

② *Bibliotheca Buddhica* 第32種是著名的沃斯特里科夫(А.И. Востриков)《西藏歷史文獻》(1962),不包括在《黑皮叢書》中。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七期
2013. 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第七期/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301-23035-0

I. ①國… II. ①北… III. ①漢學—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190819號

書名: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七期)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編

責任編輯: 武芳 翁雯婧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3035-0/H·336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印刷者: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開本 25.5印張 435千字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價: 62.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榮新江

委 員(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名):

白謙慎(美國波士頓大學)
程郁綴(北京大學)
程章燦(南京大學)
傅 剛(北京大學)
寇致銘(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李 零(北京大學)
李 慶(日本金澤大學)
劉玉才(北京大學)
馬辛民(北京大學出版社)
潘建國(北京大學)
齊東方(北京大學)
橋本秀美(北京大學)
榮新江(北京大學)
商 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王 博(北京大學)
汪 濤(英國倫敦大學)
徐 俊(中華書局)
楊繼東(美國密歇根大學)
袁行霈(北京大學)
張志清(中國國家圖書館)
趙 超(中國社會科學院)
鄭吉雄(臺灣大學)

主 編 劉玉才